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成果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Fazhan Xin Shidai Xin Luntan Yanjiu (Di Yi Ji)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新时代新理论研究
(第一辑)

曹 萍 刘吕红/主编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新时代新理论研究
(第一辑)

曹 萍 刘吕红 / 主编

责任编辑:段悟吾
责任校对:罗永平
封面设计:徐著林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新理论研究. 第一辑 / 曹萍, 刘吕红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690-1612-3

I. ①中… II. ①曹… ②刘…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2245 号

书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新理论研究(第一辑)

主 编	曹 萍 刘吕红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612-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4.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成果 /



党的领导核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理路·····	陈加飞	001
试探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	陈梅芳	015
全面从严治党应强化党员的五种意识·····	陈梅芳	028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思考·····	陈文泽	037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生成逻辑研究·····	杜黎明	056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时代意义与路径研究·····	何艺新	072
十八大以来党的文化自信思想研究·····	左慧 何洪兵	086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	何志明	11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研究·····	纪志耿 祝林林	125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背景下的微腐败治理研究·····	李建华	139
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重塑的实践与经验·····	刘吕红	151
凝聚力：治党治国的锚石·····	王彬彬 朱丽花	166
我国绿色发展的多维理路审视·····	王国敏 常璇	176
党内监督：培育党内政治信任的重要路径·····	王洪树	189
以文化自信推进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探索·····	薛一飞	207
十八大以来党的周边外交理念的形成与实践·····	羊绍武	217

党的领导核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理路¹

陈加飞²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具体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基础准备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度探索和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内在动力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目标和发展主题；理论目标致力于建构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保障在于反省和矫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践偏差；斗争方式必须持之以恒，对“反马”“非马”思潮给予坚决的批判。揭示党的领导核心形成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逻辑，加强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增强“四个意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是党领导革命以及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政治保障。那么，党的领导核心是如何形成的？领导核心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不少西方学者想不清、道不明，一些国内学者把党中央提出的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政治意识和看齐意识等重大政治遵循等同于“个人崇拜”，甚至认为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将其解读为一种“专制”话语，没有看清维护核心与发扬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认识上的彻底性是政治上保持头脑清醒的前提。辨别对党的领导核心的错误认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增强“四个意识”，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上阐明党的领导核心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也是党的领导核心形成的奥秘所在。

1 项目来源：本文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课题研究成果。

2 作者简介：陈加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助理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与历史进程研究。

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理论家、知识分子、人民群众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尤其是党的领导核心处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运转的中心，并负责对全体组织成员的活动进行协调，指挥和规划政党组织的运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领导核心形成及其地位确立之间存在的深刻关系，探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内在逻辑，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挥党中央权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贡献思想智慧和提供理论支持。

一、基础准备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度探索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

中国国情是解剖中国的关键切入口，是党的领导核心把握中国客体，进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特殊实情相结合的逻辑前提，也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现实需要。“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大实际即“总依据”就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时代特征总体上就是“革命与战争”，理论贡献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理论建构的基础性问题找到理论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最大实际即“总依据”就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时代特征总体上是“和平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基石之上的邓小平理论及其后续的理论体系建构的“总依据”。总体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穷二白”，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人口多、底子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生产力不发达”，最后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三个没有变”的整体认识，实现了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识的辩证思维转换，体现了国情客观存在的阶段性特征和党的领导核心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党的十八大后，“总依据”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布局 and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提炼“五大发展理念”，推进中国梦实践进程的国情观。在“7·26”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依据。党的领导核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组织主体中的核心，在党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对中国国情有过阶段性的认识，体现了领导核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运用能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华，既深植于具体的民族文化和实践生活之中，又提升到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高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普遍规律，是真理性 and 道义性的统一。时代特征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横向拓展的国际在场，又是制约主体目标任务及其成果体现的纵向空间在场，它们都“影响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风格与世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的实践斗争中，准确分析时代特征，适时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是领导核心形成的基本条件。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判定世界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1947年，毛泽东又对时代所处方位做出同样的判定，并指明了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世界各战略力量实力对比的消长、变化，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态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对时代特征做出了新的判定，认定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在对时代的总体看法上提出了“深刻变革论”，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是判定时代性质和趋势的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时代潮流；二是当今世界从广度和深度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三是当代中国从广度和深度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基于上述三个要点判定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与调整之中。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的时代变化，倡导“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意识，强调努力建构中国话语的国家影响力，肩负起中国对世界和时代的担当和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逐渐展开，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观，展示了党的领导核心所具备的世

界眼光。党的领导核心对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潮流的准确把握，赋予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特色。

二、内在动力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目标和发展主题

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是主体发挥其主体性的内在结构要素。对事物发展目标任务的提出及其发展主题的确立，是主体具备目标意识和认识能力的鲜明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党员、一般社会群体或社会个体不同，他们是一群有着非凡历史洞察力、现实感召力、未来判断力，对历史演进、社会发展趋势与规律具备预见性、科学性的杰出的领袖群体。党的领导核心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理论训练、人格塑造以及群体力量的发挥，与时俱进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任务。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某一个体散兵游勇式的行为，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梦想的群体共同为之以毛泽东的名义奋斗的伟大事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具有丰富内涵和科学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堪称是“化”的“第一人”“命题提出者”，塑造了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理论形象。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某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向全党、全社会提出了如何赢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所需要遵循并为之奋斗的理论目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革命赢得最终胜利也就失去了理论说明。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支撑中国共产党组织由小到大、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失败与胜利中汲取能量，不断成长、壮大、发展成熟的理性象征和理论原则，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组织主体及其实践成就和光辉历程的法宝和秘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作为全党的一个规律性目标任务被提出，不断在后续革命、社会过渡、社会建设以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续发展的理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

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再次重申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论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造性地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预设了新的目标任务。这些关键历史节点提出的关键发展目标，都体现了党的领导核心所独具的领袖能力。实践证明，理论创新能力是领袖主体非常重要的主体认识能力，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和改革新时期，这一主体认识能力都伴随着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断展示出领袖主体的能动性。改革开放以来，体现最为鲜明的不外乎党的领导核心提出的如下重要论断：一是新世纪以来体现最为鲜明的理论创新能力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指出它的发展性和开放性“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¹。二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胡锦涛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即“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新的具有历史特点的伟大实践斗争进程中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的提出，又一次体现了理论创新能力作为领袖主体认识能力的重要品格，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宝库。党的十八大后，刚形成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不久就提出“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表述，解决的是中国人民实现自己梦想的问题，堪称“中国化”的时代表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些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任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永无止境的理论追求和实践事业，因而它不仅是目标任务的提出者，也是为之奋斗实

1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过去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整合为一个体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强调指出，它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7年第21期。

现、成就这一目标任务的坚定践行者，不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组织的核心主体。

党的领导核心具备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对目标任务的清晰认识和提出上，还体现为对发展主题的不断确立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任务，离不开对其发展主题的确立。发展主题的确立，是目标任务提出的问题根源。党的领导核心要实现自身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首先确立发展主题。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的精英群体，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任务的过程当中，还根据不同历史条件、时代脉搏和实践要求不断与时俱进确立新的主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命题的提出，就是为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主题提出的目标任务，毛泽东思想就是围绕着“革命主题”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的。针对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主题，党的领导核心围绕着“坚持什么样的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如何提升政党建设”“如何科学发展”等主题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四大问题，这些历史经验概括为一点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民族化的社会主义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又接续确立一以贯之的发展主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事业的关键所在，体现了我们党领导核心形成所应该具备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三、理论目标致力于建构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主体不断吸收全党、

1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了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在“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见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08年第24期。

全社会理论智慧，不断总结阶段性实践经验，在党组织和全国活动的标志性时间节点，提炼总结形成了一系列揭示中国国情、革命和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经典理论文献，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比如，党的二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该时期毛泽东等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文献，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萌芽。大革命失败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下了诸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等，为探索和科学回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难题，最终为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论证。从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和奋斗目标的提出，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继而上升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最终庄严地写入党章，为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既是成就理论历史性的首次飞跃，又在实践上实现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形成了共同的意志力。党的十五大系统总结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并写入党章。邓小平晚年南巡发表“南方讲话”，为创造性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做了丰富的理论说明，为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指导思想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过去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整合为一个体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为党和国家取得历史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开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致力于破解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改革、法治、党建等系列理论和实践难题，既深入到经典理论宝库中探寻基本原理，又深入到当前伟大斗争实践中抓住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新常态”“文化自信”“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一系列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以“四个全面”战略实践布局 and “五大发展理念”为主体的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开拓了党的领导核心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理论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够发挥出思想的力量。“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科学实践观是实现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桥梁，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人”的理论指向，既是人类解放的学说，又论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创造和推动作用，立足于“现实的人”阐释一连串的生产运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必须依托人民群众这个实践主体，在中国必须着眼人民利益、依靠人民主体，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对社会变革和实践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的领导核心不仅肩负着“化”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任务，还肩负着“化”中国人民群众的实践任务。领导核心是核心和杰出代表，不仅肩负着建构理论文本、形成理论体系的指导性、方向性理论使命，还是理论大众化的权威，拥有理论说服群众的魅力，更能够最终使理论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对理论进行解释、说明，不断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比如，毛泽东思想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把党和人民关系比作“鱼水之情”，等等。改革开放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观点，比如，社会主义本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猫论”“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党的十七大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和任务，后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价值观的建构和大众化努力，都体现了领导核心的大众化实践。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在多个场合对其进行了全面阐释，把精神信仰比作人身上的“钙”。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在多个场合进行了阐释。习近平对此有过专门的讲话，把“改革”和“法治”形象比喻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把“四个全面”的关系厘定为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刘云山同志还把中国比作列车，把改革比作发动机，把法治比作稳压器，把党的领导比作火车头。习近平强调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全党同志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

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上述的引证说明，领导核心的权威、人格魅力，及其对理论的诠释也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号召力、感染力和凝聚力，是大众化的领导力量。

四、推进保障在于反省和矫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践偏差

主体性不等于主观性，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经历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党的领导核心能力是在遵循客观规律和自然力前提下发挥知识力和意志力的主体能动性，也就是说，领导核心绝非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能够确保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党的领导犯错误本身就体现了唯物主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的领导核心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对此，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文献鲜明体现了核心主体承担实践偏差校正者的历史责任。

道路决定命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是靠立足中国国情的“井冈山道路”的实现，这既源于对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这一独特国情的清晰认识，也是对俄国“城市暴动”具体革命道路的批判，继承的是“俄国人的路”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前进方向，超越的是俄国人“城市暴动”的具体道路，同时也是同“左”倾思想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和路线斗争的结果。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群体批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排除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干扰，邓小平批判了‘左’右倾错误思潮”，支撑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遏制了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对“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主题误判的校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征程。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和批判，引起了全党和全社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述改革开放

与当代中国命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之间“必由之路”的根本关系时强调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掷地有声的论断，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也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宣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社会思潮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挑战的强烈回击和有力批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对曾经犯过错误、遭遇严重挫折的历史觉醒和道路自信。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中国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原则和立场。“走自己的路”是领导核心对历史经验的根本总结，是“化”的根本标识，也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实事求是”又是“化”的核心灵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过程中，避免犯颠覆性错误、避免遭遇严重挑战和错误，根本的经验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品质，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突破，为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中的偏差，消除前进道路中的阻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偏差纠正者，使党的领导核心发挥符合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

五、斗争方式必须持之以恒对“反马”“非马”思潮给予坚决批判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因，认识事物根本在于认识事物的矛盾，矛盾具有斗争性一面，又有同一性一面。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是需要经过“斗争”才能够获得发展，这正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体现。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是一条永恒的定律，“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思想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思想斗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本身就是矛

盾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和不断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它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因此，同“反马”思潮斗争，批判性吸收“非马”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党的领导核心形成所必须具备的意识和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正是由于有敢于、善于同各种社会思潮争辩的由党的领导核心凝聚起来的党中央。

党成立之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形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体斗争的结果，这在毛泽东运用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结构分析模式的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拓了理论视野和提供了理论准备。到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同以“立三路线”为代表的城市中心论进行思想斗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实践和理论上开创了独特的革命道路。与教条主义的斗争提升了组织主体的调查研究能力，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领导权和决策权受到苏共的操控，党内出现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现象。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照搬经验、忽略实际、背离基本理论精神，铸成摇摇欲坠的中国革命斗争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思想路线，就是在这种危难之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主观主义、党八股、宗派主义等党内顽疾的斗争和彻底批判，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想环境。自1938年中国化命题提出之后，组织主体开启了端正思想路线的斗争历程，到1942年延安“整风”大规模开展了学习和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潮，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斗争和实践开拓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主题指导下遭遇重大挫折。1956年，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党的八大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使得党内思想斗争扩大化，最终导致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这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几乎中断。混乱与安定本是一对矛盾，但过激的内乱遭殃的是党的生存与发展乃至民族的安危，历史总是在挫折中吸取前进的养料，“文革”后，党的组织和领袖

主体在“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逐步开辟出新的理论境界和实践平台，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营造了思想氛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扬帆起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产生一系列理论斗争与复兴发展的光辉典范。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道主义异化、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¹。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就是一部由不同时期党的领导核心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同“反马”“非马”不断论争和发展的思想交锋史。这正是党的领导核心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主义信仰、实现理论创新的不可忽视的主体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严重挑战，特别是“苏马非马”“以儒反马”“以儒化马”“以儒谈马”“以西马释马”“指鹿为马”“指马为鹿”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尤其值得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核心兼具政治家和理论家的特质，领导核心能否在理论上发挥能动性，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要看能否发挥理论家对“反马”“非马”的争辩，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大众化的捍卫和发展。一方面，成为同“反马”思潮做斗争的战斗士，自觉捍卫真理；另一方面，做一名严肃的科学家，勇于探索真理，成为像列宁评价恩格斯那样的“严谨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面对各式各样思潮“雾霾”的笼罩和侵害，兼具政治家和理论家为一体的习近平总书记既体现出了“理论战斗士”的非凡魅力，又彰显了“科学研究

1 比如，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产权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表，探讨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评析西方产权理论；评析新自由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评析历史虚无主义，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发表，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问题；评析民主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评析‘普世价值观’，等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